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人史綱

中華書局影印

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第一部（下冊）

中國人文網

柏楊著 星光出版社印行

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第一部

十二版校訂

中國人史綱  
(上冊)

柏楊著 星光出版社

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第一部

中國人史綱  
(下冊)

柏楊著 星光出版社

1979. 1. 一版  
1979. 3. 再版  
1979. 8. 三版  
1979. 9. 四版  
1979. 11. 五版  
1980. 5. 六版  
1980. 10. 七版  
1981. 4. 八版  
1982. 2. 九版  
1983. 5. 十版  
1984. 10. 十一版  
1986. 1. 十二版

第一學期研究中歷楊柏

中國人民史綱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號九六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 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總序

柏楊

——原載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第五〇期臺北「愛書人」雜誌

我們十分感謝柏楊先生將其「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總序」，交給「愛書人」先行發表。這套叢書刻已付梓，即將陸續問世。為使讀者有一印象，編者謹對叢書所包括的三部巨著的內容，先作簡單介紹如下：第一部「中國人史綱」是一部通史，但與過去所有的通史都不相同，它把中國歷史分為「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信史時代」。不是以王朝或以其他範疇為單元，而是以「世紀」為

單元，使讀者可以精確的了解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而柏楊先生指出中國每一個王朝都有其瓶頸時代，尤為特有卓見。且其行文如流水，條理分明，觀察入微，分析深刻，集幽默嚴肅於一身，相信讀者對柏楊先生了解甚深，用不着編者多予引介。第二部為「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把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所有的王朝（包含邊疆國度，如匈奴、突厥等），和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以及寶座的世系，春秋諸國君主、草莽君主，搜集無遺，用表格一一詳明的列出。是研究歷史或愛讀歷史者，必備的工具書。由此一卷在手，讀者可以探囊取物，很容易的撥開混亂的迷霧，一目了然。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不是普通的大事記，而是一部可讀性很高的參考書。同樣以世紀為單元，而將王朝、國號、干支、年號，列在耶穌紀元之下。讀者僅從國號、年號的排列情形，即可推斷出中國在那個時代是統一抑或分裂，是太平抑或戰亂。因年號並列之故，讀者在閱讀如春秋、戰國、兩晉南北朝、五胡亂華、五代、宋遼金，以及各王朝交接之際等史籍時，可以清晰的顯示出事件的關係位置，幫助

瞭解。

這三部巨著，是柏楊先生十年孤窓的辛苦結晶，希望他的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也能早日完成。本刊和本刊的讀者都在期待他，除了用他那舉世欣賞的雜文外，還在學術上繼續貢獻他的智慧。

——「愛書人」編者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艱難而漫長的歲月裏，我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先後完成了三部書稿，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另外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員要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個端陽節」，把所有的參考書都搜去保管，規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書，所以只寫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臺北，幾經轉折，三部書稿陸續的重回身邊。面對着汗跡斑斑，顏色枯黃了的紙冊，我有無限的感恩和熱情。

但書稿似乎太多了，從地面幾乎直堆到腰際。想到它們在成書之後，每部勢將都在一千

頁以上，我茫然的憂慮到出版的困難。幸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猶豫的慷慨承當，並爲它定名爲「柏楊歷史研究叢書」，使我由衷的感動。不過三部書稿並不是按照順序發排的，而是倒轉過來順序發排的。並非故意或願意如此，種種原因之下，只有如此。這只屬於小節，當三部書陸續出齊的時候，出版時間的先後，就不重要了。

## 一

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渤海，都是效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爲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而只是興之所至，都會弄出來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昭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

二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的混亂。我們可以試行作一次檢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的答案當然是相距六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一二六四，一個始於一三三五。再試行作第二次檢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六年，可能是紀元後三三〇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〇〇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〇八年。所以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置身於瞬息萬變，分秒必爭的時代，實在沒有繼續埋葬在這種糾纏不清的年號迷魂陣裏的必要。我們大膽的繞過年號，採用耶穌紀元，希望能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的立即明瞭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號和國號，是第二個大的困擾。十九世紀時，外國人會嘲笑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引起國人的憤怒。其實在薩丁尼亞王國以意大利作為國號之前，意大利固然也是一個地理名詞。現在伊斯蘭卡共和國建立，錫蘭也同樣成為地理名詞。事實上，

在二十世紀中華民國建立之前，中國所有的王朝，從來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法定的或正式的國名。每當一個新王朝興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個國號，當這個王朝統一中國時，它的國號就遠壓在中國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國號就是大清帝國。當中國陷於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國並存，就誰也都更不是中國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觀，即四千多年歷史中，從黃帝到傀儡政權滿洲國，中國境內出現了像樣的或不像樣的共計八十三個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國，和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却沒有一個是用「中國」顯示他們的性質的。我們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戰爭」，在正式官文書上却是甲午「清日戰爭」。這種情形，使王朝號、國號，跟年號一樣，造成史籍的混亂。因爲誰也沒有標出中國的緣故，就發生了誰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是「正統」的爭執，這爭執由政治滲入學術，使從事歷史工作的史學家，頭上都好像懸着巨斧。司馬光在他的編年史資治通鑑中，曾爲此費盡唇舌，解釋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惡昭彰的政權，用它們的年號作爲正朔，用它們的王朝作爲正統。但他這部價值連城，被後世列爲「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爲它寫了一篇序的緣故，恐着早被查禁燬版。於是集叛徒、土匪、強盜、惡棍於一身的朱全忠之類，明明只是一小塊土地的割據局面，年號却成爲正朔，王朝却成了正統，因而使中國產生了一種可恥的「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歷史上的忠奸賢愚、是非黑白，遂大量的受到顛倒、破壞、甚至被惡毒的一筆抹殺。

我們現在對所有的王朝號、國號，以及年號——包括凡是有記載的草莽英雄們，以及他們所定的王朝號、國號、年號，作一個徹底而廣泛的整理，排列出來，由分類而歸納，提供出一個工具性質的參考資料，可以迅速而簡便的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時，我們更作一個從無前例的大膽嘗試。即以「世紀」為單元，以耶穌紀年為紀年，而將王朝號、國號、年號，置於次要的地位。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强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

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我們以「世紀」為單元敍述，是強調中國永遠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響，我們絕不認為後梁帝國是正統而前蜀帝國是僭偽；更不認為清王朝是正統，而鄭成功是海盜。唐亡，不是中國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滅。清亡，也不是中國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滅。中國固屹立如故。

中國科舉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貢獻，但它的副產品之一是，培養出來一個中國所特有的「官場」社會階層，在這個社會階層中，阿諛帝王成為一項主要的課題。表現最強烈的莫過於媚態可掬的加到活帝王頭上的尊號，和加到死帝王頭上的謚號，（為了行文便利，我們用

「尊號」包括「謚號」。上古時候，這些尊號不過一個字兩個字，如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第一任王姬發，不過被尊爲「武王」。隨着阿諛技術的精益求精，到了紀元十五世紀之後，如清王朝第二任皇帝福臨，他的尊號是「禮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個字，全都是從字典上挑選出來的最美麗的詞彙。有些人從沒當過帝王，也會在他們頭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號，當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書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李耳。在史籍引敍原文的時候，這種尊號更顯示出沒有原則的一面，像談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過是東漢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面，却一會稱他是「太祖」，一會稱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們不知道所說何人，又置身何地。我們當然諒解並同情古史學家的可悲處境，但我們也不掩飾我們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從最簡單的「王妃」到那拉闌兒「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仁獻崇熙顯皇后」，這個用全力摧毀自己所領導的清王朝的女人，竟擁有這麼漫長肉麻當有趣的尊號，使我們忍不住失笑。但我們最大的苦難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們所作的是對中國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雖沒有實質上當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號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之間，以及他們在皇族中的關係位置，加以仔細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經過辛苦的

尋覓，即可對他們的身世，有一個明確的了解。

最後，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幾句話，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立場是中國人的立場。不同於「奉旨修史」的官員立場，也不同於以王朝爲主，以帝王將相爲主，以統治階層自居的立場——他們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國放在第二位。我們反對「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在那種史觀上，很多醜惡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國人磅礴剛強、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醜化。如三保太監下西洋，傳統歷史責備他勞民傷財，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們則認爲他是中國第一位最偉大的海上英雄。我們堅持的標準是國家民族和人道人權，不掩飾污點，猶如美國歷史不掩飾吊人樹一樣，同時也展示出中國對全世界全人類文明所作的尊嚴貢獻。

中國人了解中國歷史，應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很多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只不過知道一個片斷，而這片斷還多半來自小說和戲劇。中國歷史書籍之多，佔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種雜蕪凌亂的感覺。即令把正史能倒背過來，對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仍沒有太大的幫助。何況我們沒有時間讀完正史，也沒有文言文的修養去讀正史。司馬遷創造了一種新形式的史籍，這形式在紀元前較簡單的社會，還可以應付。可是史學家却被這種形式醬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更糟糕的是，它被改爲斷代史。幸好中國的王朝不斷變換，如果像日本那

樣萬世一系，根據「國（王朝）亡才修史」的慣例，中國可能成爲一個沒有正式史籍的國家。這些國（王朝）亡了才編纂出來的正史，又不過是一大堆人物傳記的合訂本，而這些傳記，又多半取材於該人物的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的一面之詞。以致數千年來，墓誌銘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的地位。凡是善於阿諛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韓愈，都享有相當地位和相當財富。墨索里尼的兒子在紀念他父親的文章中，說他父親：「喜歡古典音樂，看見我開始彈鋼琴時，非常高興。他爲人極爲和藹，對人更是溫柔。」我們不認爲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所提供的資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兒子所提供的，更爲可信。所以，我們在採用正史資料時，都一一加以判斷。

## 三

意不盡而言不能不盡，最後，我願述及我對叢書處理的願望。我虔敬的把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獻給孫觀漢先生。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贈給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贈給陳麗真女士，用以表達我無窮的謝意。

我和孫觀漢先生——這位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中國第一個原子爐的裝置人，迄今還沒有見過面；但我縱是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語，都表達不盡我的內心。像

我這樣渺小的人物和奇離的遭遇，不過大時代中的一粒灰塵，隨風飄蕩，微不足道。但孫觀漢先生，亘古以來，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孫觀漢先生比爲左拉，但孫觀漢先生比左拉更偉大更艱苦。他像大海中的一葉孤舟，爲營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淚、尊嚴、時間、金錢、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氣，不僅是爲我一個人，而是對祖國一片丹心，和對人類一片愛心。西方有句諺語說：「爲朋友死易，找到一個值得爲他死的朋友難。」而我找到了，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光榮。蒼天可鑒，爲孫先生，我死而無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識時，她還是一個髮與耳齊的女學生。她第一次給我寫信，那麼流暢和那麼有深度，使我震驚。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後，她到臺北飛機場接我歸來的時候，已是大學教授了。年齡、知識、智慧、和社會經驗的增長，使她更堅定對我的幫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也更堅定她對國家的愛、對人道的愛，和對人權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顯示出來，她是一位孝女。

陳麗真女士是我的讀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來探望我之後，她就成爲我的學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離子散之際，她一直照顧我的生活，探望我，給我寄衣服食物，末了還爲我作保。她爲了幫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沒有遭受到的風暴打擊，幾乎使她精神失常；

但經過無數次恐懼哭泣之後，她沒有放棄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溫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 四

叢書是我在火爐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牆角，或坐在地下，膝蓋上放着用紙糊成的紙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寫成。參考書的貧乏使我自慚，但我別無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這些艱難寫出的書稿，會遭受到什麼命運。所以不可避免的會錯誤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現在，總算陸續的付梓，當叢書出齊之日，我覺得我對我的國家，和對我的朋友，已盡了我最大的責任，和獻出我最大的感恩。